

十一、美利坚的中国学生

此书谨献给被召回的留美幼童记取并彰显他们为架起中西方交流的桥梁所做出的努力。

——拉法吉《中国的第一个一百》

1854年11月，美国耶鲁大学校园里正举行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司仪朗声念着每个毕业生的姓名，校长逐一颁发文凭。

口齿伶俐的司仪突然有个小停顿，然后费劲地念出一个简短但拗口的姓氏发音：“Rongh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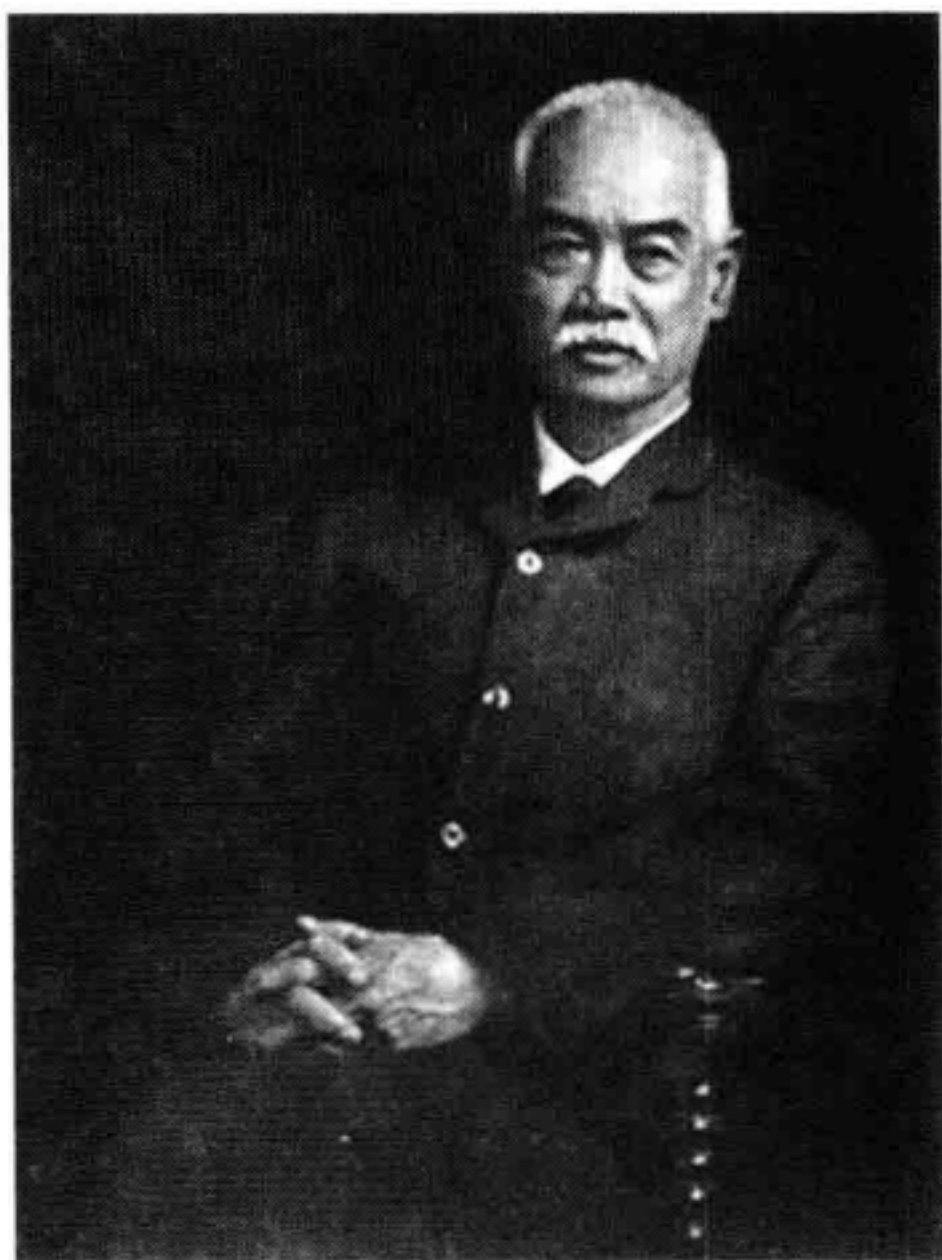
一个黄皮肤、黑眼珠、身穿学士袍的中国人接过毕业证书，在金发碧眼的西人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他是中国第一位海外留学生——容闳，1828年11月17日出生于珠海，因为家里穷上不起私塾，容闳自幼到澳门的教会学校接受免费教育。

在这里，容闳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恩师，校长布朗。

1846年，布朗校长准备回美国，他希望带几名中国学生到美国接受进一步教育。

布朗先生在课堂上要求愿意去美国的学生起立示意。



中国第一位“耶鲁男孩”，被誉为“留学生之父”的容闳



课堂上一时鸦雀无声，学生面面相觑，没一个人应声。当时这个教会学校的学生共 20 来人，人数不多却是藏龙卧虎，除了容闳外还有招商局的第一任掌门人唐廷枢、中国最早的医学博士黄宽、香港最早的华人太平绅士黄胜。

容闳第一个起身，随后站起来的还有黄胜、黄宽两人，三人的学费均由学校董事会的校董捐赠。

1847 年 1 月，容闳、黄胜、黄宽跟随布朗先生登上“亨特里斯”号经印度洋绕道“好望角”抵达美国纽约，然后到马萨诸塞州进入孟松预备学校。三人都进入孟松学校的英文班中补习英文并广泛接触算术、心理学、哲学课程。

第二年黄胜因病返回中国，长期致力于中国出版业，翻译了《火器说略》，创办香港第一份中文报纸《中外新报》，成为香港最早的华人太平绅士。

黄宽则转赴欧洲，入爱丁堡大学学医，拿下医学学士和文学学士双学位，其后专攻病理学和解剖学获得博士头衔，成为中国西医之父。

容闳继续留美深造，1850 年容闳考入美国常春藤名校——哈佛大学，成为该校的第一名中国学生。

容闳很快融入当地社会，他剪掉长辫，换穿美式服装，广泛涉猎西方宗教、法律、社会、哲学领域，深深感受中西方教育理念、体制上的天差地别，逐步萌生了启迪民智，让更多的中国人接受西方式教育的想法。

1854 年 11 月，毕业后容闳回到阔别七年的中国，探求救国救民之路。一开始容闳对信仰上帝的太平天国产生兴趣，1860 年容闳与两名美国传教士共同探访太平天国控制区域，经过考察容闳认为太平天国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投机分子，迅速离开南京。

时光飞逝，转眼间容闳已经回国九年，心中报国志向无缘施展，心情难以平复。



恰在此时，曾国藩正为中国近代化改革寻找人才。了解容闳的情况后，曾国藩立即修书一封希望面谈。

容闳与曾国藩的见面立刻碰出了火花，曾国藩劈头就问：“当前中国最紧要最有益的事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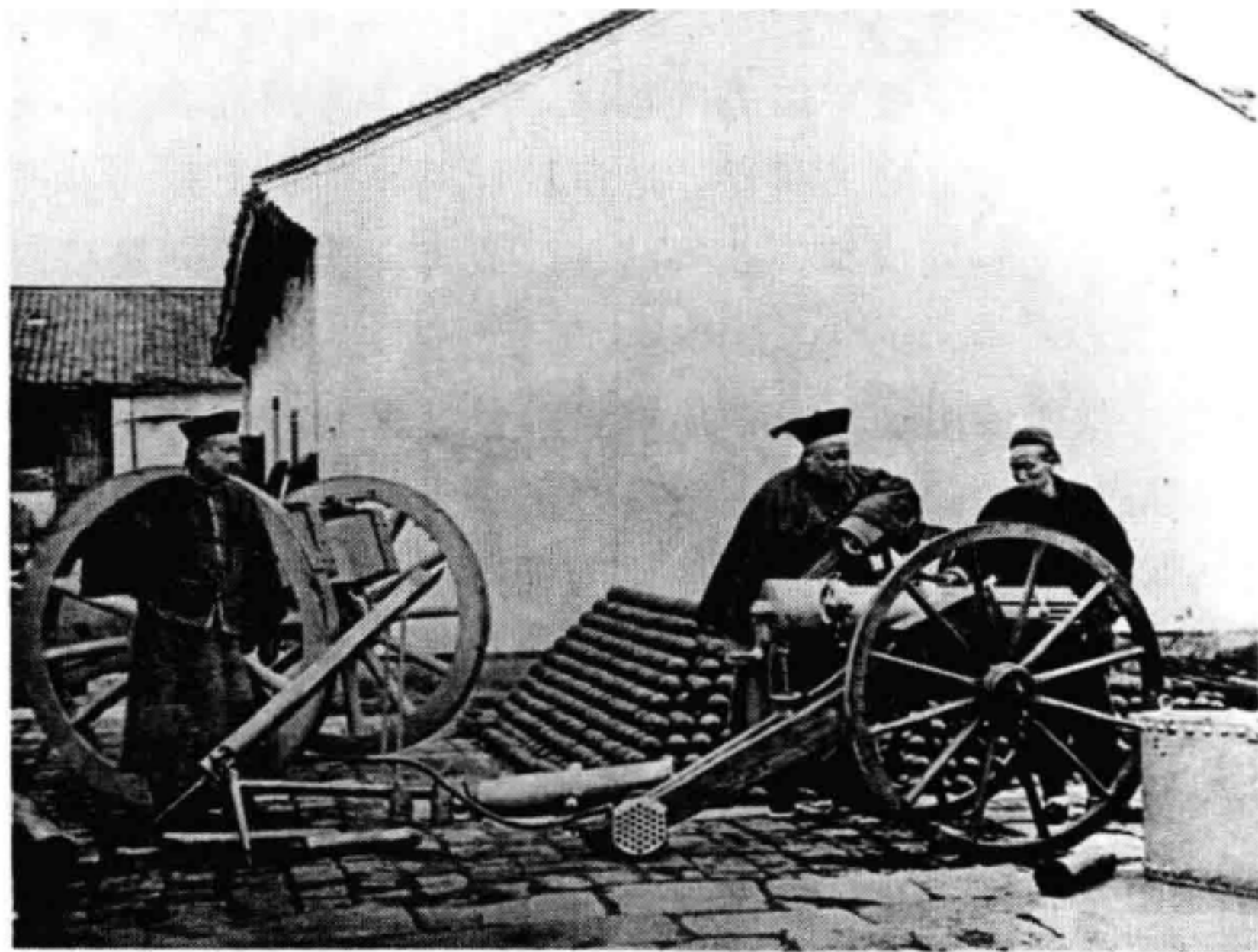
容闳心中想的是教育，但转念一想，大清朝野上下都在追捧洋枪洋炮，还是顺着标准答案答，先取得信任再徐图进言。

容闳回答：“当今最重要的是开办机器厂，生产洋枪洋炮，不再受制于人。”

曾国藩听了十分高兴，当即保奏容闳为五品实官，委托容闳负责到美国购买办厂的机器设备，在中国开办一家近代工厂。

1865年，机器按期运回中国，工厂选址上海黄浦江畔，这就是近代中国第一家新式工厂，晚清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

该厂以生产枪炮弹药开始，日渐发展成为修造船舰、冶炼钢铁、机械制造为一体的综合企业。它建成了中国第一座炼钢炉，生产大



江南制造总局仿制的“加特林”机枪

量车床、刨床、钻床、起重机、抽水机，被称为“机器母厂”，中国近代工业化就此起步。

江南制造总局成为晚清改革开放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印记，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原址仍然有条“制造局路”，沿着这条路走到尽头就是上海世博会的入口。

百年之后，江南制造总局原址建起以“城市改变生活”为主题的上海世界博览会展馆。

一百四十年后中国上海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向世界张开胸怀，缅怀见证百年来这座“东方巴黎”波光流转、魅力四射的海派风情，向世界展示一个崭新、传奇、充满活力的中国。

江南制造总局筹办的成功，大大提升了容闳在曾国藩心目中的地位。容闳开始逐步向曾国藩推销其宏大的计划——派遣华人接受西方系统教育。

这在当时中国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便是洋务派的大臣都觉得过于激进。

容闳为此采取了循序渐进的策略，先是尽力做好大家都感兴趣的表面文章，买来上好的机器、造出性能不错的枪支弹药和战船火炮，让领导们先看到成绩，获得政绩。成果出来后，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机器、战船使用过程中有损坏，维修、保养、零件更换是个大问题，要请外国技师。战船火炮造好了总得有人会使用吧，这就必须掌握坐标参数、绘图测量等一系列天文地理知识，当时读书人打小都啃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这些玩意儿都弄不明白。这总不能都让外国人代劳，因此必须要培养洋务人才。

经过容闳多方奔走、呼号，洋务派官员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潜移默化中开始接受容闳的观点。

当时，风气初开，保守势力非常强大，你想仅仅是同文馆开设天文算术科，招收举人学工科都在朝中掀起大论战，恭亲王亲自出



马打擂台才勉强得以通过。送中国孩子到美国读书简直就是卖国求荣，典型的洋奴。洋务派官员虽然内心赞成但都认为时机不成熟，怕犯路线错误，不敢公开上疏。

这一等又是三年，中国北方总镇天津发生的一件血腥的“闹教”事件最终促成好事。

鸦片战争后，西方基督教获得合法地位开始在中国迅速传播。中国老百姓对舶来品基督教不感兴趣，这基督教也是自有一套吸纳信众的方法：一是教会出钱买地让流民耕种；二是开医院救死扶伤；三是创立育婴堂，设立孤儿院，信教从娃娃抓起。

这土地、教育、医疗三件事都是造福黎民的大好事，但恰恰就出了问题。这买地耕种，让不信教的农民眼红，认为祖宗之地给洋人夺去。医院进行外科手术，割掉器官，甚至会死在手术台上，容易出现医患纠纷。收养孤儿，以当时的卫生、医疗条件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话说回来，老百姓自家养的亲生骨肉死亡率远高于教会，但中国有句俗语“后娘难当”，这自家养死了十个八个没人说三道四，后娘养得再尽心尽力，一旦有事唾沫都淹死你。

1870年春天中国北方最早的通商口岸天津连续不断发生蹊跷的幼童失踪事件，痛失爱子的年轻父母聚集在衙门击鼓鸣冤，哀哭之声震天动地，在社会上造成大面积恐慌。

这年夏天来的特别早，酷热的天气导致疫病流行，育婴堂中有孤儿患病死亡，每天有数百人到坟地围观，挖出孩子的尸体查看。于是农民开始传言修女以育婴堂为幌子，杀死孩童取出器官作为药材。

正当谣言越传越广之时，一名人贩子武兰珍被群众扭送官府，这人贩子被扭送途中就被愤怒群众暴打，进了局子又是一顿板子伺候，已是奄奄一息。

这拐卖幼童案发生在直隶辖区天子脚下，又是系列恶性案件，社会影响极大，刑部挂牌督办，迅速抽调精兵强将成立专案组，深

挖犯罪。接下来就是刑讯逼供，一通大刑伺候，跟着泼凉水、车轮战审讯，连着几宿不让睡觉，饶是你铁打的人也熬不住。

人贩子开口交代，话匣子一打开顺着就扯到教会的育婴堂，专案组都是些爱国青年，一听教会兴趣来了。这人贩子为了不挨打接着绘声绘色说是教民王三教唆他干的，说是用糖果瓜枣把幼童引到偏僻的地方，麻袋一装扛到育婴堂，放在西侧栅栏围绕的席棚中大卸八块。

这下事情大了，案件有了突破性进展，天津知县亲自挂帅，自任专案组组长，组织力量深挖积案，上面也有指示要办成铁案。

专案组成员爱国热情高涨，主动放弃休假，加班加点整理案卷，同时忙里偷闲把案件最新进展在朋友圈里演绎一番。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万。群众的智慧再次被证实是无穷的，于是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

6月21日清晨，天津知县刘杰带人犯武兰珍去教堂指认犯罪现场和主犯，却发现该堂并无王三其人，也没有武兰珍所供的席棚栅栏，这作案人和作案地点都对不上，压根儿就是子虚乌有。

这下专案组摆了个大乌龙，下不了台。爱面子胜过爱国的专案组只能死咬着“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莫须有”。

洋教士群情激奋要求挽回名誉，赔礼道歉。

此时数千群众包围了教堂，群众开始起哄、丢杂物，冲击教堂。

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要求政府派兵保护，遭到地方政府拒绝。丰大业与天津知县刘杰发生激烈争论，继而发生肢体接触，情绪激动的丰大业掏出枪，混乱中一名衙役被击中身亡。

场面已经完全失控，愤怒的群众杀死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继而冲入教堂，纵火焚烧。随后愤怒的人们开始丧失理智冲击焚烧法国领事馆和六座教堂。二十名神职人员和法国侨民以及三十多名中国教徒被杀，骚乱持续了三小时。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火烧望海楼”事件，史称“天津教案”。



此时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已是英雄暮年，各种慢性病折磨着这位老人。五十九岁的曾国藩右眼失明，患有严重的肝病、眩晕症和皮肤病。

日益严重的疾病使他无法坚持工作。6月23日，朝廷以“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咨询口气，希望他去处理天津教案。

就在接到朝廷谕旨同一天，他为自己做棺材订购的木料运到。这个不祥的预兆，让曾府上下极力反对曾国藩介入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犹如挂在家门口的马蜂窝，怎么绕都绕不过去，总得有人去捅。无论如何处理，捅马蜂窝的人结局都是鼻青脸肿，要么被马蜂蜇，要么被看客打。

曾国藩完全可以托病避开这个马蜂窝，但是这个年迈多病的老人的人生词典中从来就没有“退缩”二字。

曾国藩预感到天津教案将使自己陷入名声扫地、众叛亲离的绝境，在介入事件善后之初，他就抱着必死的决心，书写遗嘱交代后事。

这篇遗嘱中没有对天下大势的分析和对国家前途的担忧，通篇讲的都是琐碎的子女教育、家庭和睦等问题。

在出将入相，一生功业达到顶峰之后，曾国藩以一种绚烂极致是平淡般的洗尽铅华、返璞归真的姿态回到了起点。这时候他与所有平凡普通的老人一样，牵挂儿孙，眷念故土。

7月8日，曾国藩抵达天津。天津教案的办理过程中，曾国藩殚精竭虑，耗尽心力，既要秉公办理，避免矛盾激化，酿成兵祸，又要考虑国内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可谓左右为难，两头受气。

7月21日，曾国藩亲笔呈报朝廷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出炉。在这份奏折的开篇，曾国藩分析了教案的由来即民间传言教会拐骗儿童，剖心挖眼入药，“全系谣传”、“毫无实据”。他说：来到天津后，细细查问了几百名拦轿喊冤的群众，每个人都义愤填膺指控洋人残害儿童，当问到是否亲眼所见，残害的是谁家儿童这些

关键细节时，答复都是千篇一律的“道听途说”；他逐一询问了教堂收养的150余名幼童，都说是自小家里送到教堂，绝非拐带。更匪夷所思的是，曾国藩抵达天津十几天以来，居然没有一户丢失小孩的家庭来报案，这是个没有原告的怪案。事实证明，传闻的任何一个环节，从幼童失踪、人贩诱拐到“挖眼剖心”，都是毫无根据的以讹传讹。

曾国藩认为：为防止事态恶化，对于首恶分子必须按法律严惩，对于洋人要求处斩玩忽职守的地方官，应据理力争，认为官员渎职需交中方处理，同时调兵入津，维持社会治安。

曾国藩的处理意见可以说是“有理、有利、有节”，既尊重事实，又考虑到当前的复杂形势，是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处理方案。

但在晚清的社会，这个处理意见把曾国藩推向了民怨沸腾的火山口。

几天以后，朝廷将这份奏折发抄朝野、征求意见，举国上下掀起了声讨浪潮，责难的信件如雪片般飞来，在北京的湖南同乡会把他题字的匾额砸碎，取消他的会籍。更有人刻薄地挖苦他“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

朝廷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将曾国藩调离，委派李鸿章接任，继续处理天津教案。李鸿章完全赞同曾国藩的处理意见，两人书信来往讨论处理办法时，李鸿章直言不讳地表示：完全赞同处理意见，但是，说真话肯定要挨骂，既然您已经陷进去了，我再去顶多是个陪骂的。不如您一个人挨骂，我留在岸上才好帮您处理其他遗留问题。

于是，曾国藩一力将事情顶下，李鸿章等到曾国藩与外国拟定善后条款后才赴任，逃过“卖国贼”的骂名。他恐怕无法预料到，未来自己的“声名狼藉”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正是在此次交涉中，曾国藩等洋务大臣痛感民智未开、百姓愚钝之弊，容闳的留学计划得到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一致肯定，决定联名上奏，要求清廷派遣公费留学生前往美国接受西方教育。



曾国藩在自己生命最后两年中，一改以往低调稳健的风格，相当激进地连上三封奏折，痛陈民智未开之弊，字字血泪，恳请朝廷痛定思痛，培养西学人才，图百年富强大业。

同治九年（1870年）冬，清廷最终同意派遣幼童留洋。

同治十年七月，曾国藩、李鸿章等上奏选派留学生章程十二条。1872年，经过一年多筹备（包括招生并进入上海预备学校学习），中国首批留学生正式赴美留学。

此次留学计划，可谓谋划周密，规模宏大，整个计划为期十五年，让派出的学生在美国接受完整的中学、大学教育。选派的学生年龄限定在十二岁到十五岁之间。留洋前在上海进行为期半年的语言、礼节强化培训，抵达美国后分别由美国家庭代为监护，照顾日常饮食起居，彻底融入当地社会。

对于留学监督的人选，曾国藩也是反复斟酌。容闳自然是第一人选，但是考虑到学生出洋后可能出现的种种状况，极易成为国内保守势力反对的口实。曾国藩推荐刑部主事陈兰彬为留学事务主监督，容闳为副监督，陈负责学生国文教育，容闳负责西式教育。

陈兰彬是翰林出身，官虽不太大但在国内学界有一定威望，国学功底没几个人比得上。而其人多年京官经历，一直没熬出头，革命意志衰退，不爱管事，容易相处。以陈兰彬为盾牌，容闳具体负责，可以对国内保守势力的唇枪舌剑起到较好的防御作用，保证留学事务顺利进行。

由此可见，洋务派官员的人才出洋培养计划可谓用心良苦。公费留学计划确定后，第一步是招生，招生榜贴出来后，应者寥寥，第一批幼童三十二个名额竟然招不满员。

这在今天看来是个咄咄怪事。公派留美在如今是祖坟冒青烟才能摊上的好事，而在百年前的人们眼中是离经叛道、丢尽脸面的丑事，更何况要一去十年，音讯渺茫。

因此，只要是家里有口饭吃的，都不愿送孩子去留学。

容闷急得口舌生疮，最后亲自跑到珠海老家唐家湾现身说法，动员亲戚朋友，勉强凑齐三十名幼童带回上海进行出国前的培训。

在上海留洋预备学校培训期间，曾国藩拖着病体接见留美幼童，在天津教案中饱受煎熬又顶着巨大压力促成幼童留美，曾国藩耗尽最后一点心力。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午后在花园散步，突然感到双脚发麻，吃不上力，站立不稳。陪同散步的儿子曾纪泽连忙将其扶回书房，曾国藩已经无法说出话来，端坐三刻，与世长辞。

早在三年前，1869年夏日的深夜，保定府直隶总督衙门后花园，曾国藩与他的幕僚赵文烈进行一番剖心沥胆的对话，流露出对国运和传统文化日渐衰危的担忧。

曾国藩认为当今之世已是“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文烈同意曾国藩的观点，并大胆预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殆不出五十年”。认为国运将近，撑不过五十年。

曾国藩提出“南迁”、“本朝君德正”等观点被赵文烈一一反驳。

曾国藩无言以对，沉默良久：“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

曾国藩作为传统士子基于文化本源性对传统文化有着难以割舍的真挚情感。



第一批留美幼童出国前在轮船招商局门前合影

他不希望传统文化衰微，又不得不承认历史潮流不可逆转，以至于他宁愿早死，以免亲眼目睹王朝和传统的覆灭。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他极力推动洋务运动，促成幼童留美，期望通过“师夷长技”挽救复兴传统文化，中兴



王朝。

传统儒家文化最后圣贤曾国藩辞世意味着一个“农耕诗书”厚重时代的终结，五个月后，第一批三十名幼童背负国家民族的期望负笈出洋，则预示下一个崭新的大时代来临。

幼童们在旧金山登陆，乘坐火车干线横穿美国大陆来到新英格兰的康涅狄格河畔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翻译成中文就是“春天的田野”，孕育希望的地方。

当时，马克·吐温正在这座小城构思他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小城的另一端还住着功成名就的斯陀夫人，她正靠着早年的作品《汤姆叔叔的小屋》源源不断的版税过着富足安逸的生活。

中国孩子的到来，让春田小镇一下热闹起来。为了让这批幼童尽快学习语言，并得到家庭的关怀，在容闳的积极奔走下，美方将中国孩子三五一组，分散到康涅狄格河谷的美国人家中。

康涅狄格州教育局局长诺索布专门给美国家长写信，要求家长们注重幼童的道德培养，强化中文。要让中国学生学会现代卫生常识，养成勤洗澡的习惯。特别是在户外活动出汗后要特别谨慎，防止风寒，以免发生意外。

美国家庭对幼童的照料无微不至，幼童们很快跟美国的同龄人打成一片，他们打棒球、骑自行车、打猎，参加派对、舞会，甚至与美国姑娘恋爱。

幼童梁敦彦（后任清朝外务大臣、北洋政府交通总长）、蔡绍基（北洋大学即现在的天津大学校



拿着猎枪、一身西部男孩打扮的曹嘉祥，后来他成为中国警察的创始人之一

长)、黄开甲(1904年世博会清国代表团副团长)和詹天佑(京张铁路总工程师)等人组建了“东方人棒球队”。他们经常参加各地的棒球赛,淬炼体魄和意志品质,这支由清一色华人组建的棒球队在康涅狄格州小有名气。



东方人棒球队全家福

幼童吴仰曾(后任开平煤矿副总办)对一切新事物抱有浓厚的兴趣,他用津贴买了一辆自行车,成为春田中学第一个购买自行车的学生。

独立、自信、外向、勇于冒险、敢于自我表达的性格逐渐养成,幼童如雨后春笋般呼吸自由空气,在春田小镇健康成长。

1876年留美幼童集体赴费城观摩世博会,得到美国总统格兰特的

接见。幼童在接见中彬彬有礼,谙熟西方礼节,表现十分得体。

从1872年到1875年,清国总共派出四批一百二十名幼童留美,历时十年。

前几批幼童读完高中进入美国一流大学深造,耶鲁大学的最多,有二十二人,麻省理工有八人,哈佛大学两人,哥伦比亚大学三人。

在美国大学里,幼童积极参加社团活动,纷纷剪去长辫、脱掉长袍。钟文耀(后为驻马尼拉总领事、京沪铁路局局长)作为耶鲁大学赛艇队的舵手,连续两年夺得耶鲁、哈佛大学对抗赛的胜利。



然而，留美幼童日渐“西化”的行为和风格却引起了守旧官僚的愤怒与攻击，他们认为幼童“再在美国久居下去，必将失去他们全部的爱国之心，纵然有朝一日学成归国，不但无益于国家，且将有害于社会”。在多方压力下，1882年，清廷中止已经进行十年的留学计划，召回留美学生。

此时，已有五十名幼童进入美国大学，其中詹天佑和欧阳庚已经从耶鲁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

1882年幼童分批撤回，去国十年，漂泊海外，回到上海的幼童遇到无法想象的冷遇和歧视，码头上没有憧憬中的欢呼的人群和祖国温暖的怀抱。歧视、冷漠、怀疑和指责接踵而来，幼童们张扬的个性和举止被视为异端、洪水猛兽。孩子们被集中封闭在郊区一所院子里隔离，并严加看管，不得外出。在美国长大的年轻的海归们对这一限制人身自由的做法进行激烈的反抗。

后来担任清廷外务大臣的梁敦彦挺身而出与身为哈德福特高中拳击冠军的另一位留美幼童一同强行闯关，将门卫打得鼻青脸肿，破门而出，到郊外踏青去了。

第二天，当局被迫解除禁止出门的禁令。

后来，留美幼童们被分到海军、电报等行业从基层做起。历经几十年起伏跌宕，这批人成长为晚清民初这个大时代中各个行业如工矿、铁路、电报、海军、外交界的领军人物，涌现出两位国家总理、两位海军司令、三位部长。

其中，有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辛亥革命时期作为北方代表、袁世凯特使促成南北和谈；有清朝外务大臣、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梁敦彦；有民国外交、交通总长梁如浩；有清政府海军舰队司令、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内阁代总理蔡廷干；有天津巡警道、闻名全国的“北洋警政”缔造者、中国新式警察的创始人曹嘉祥；有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有天津大学校长蔡绍基；有西南交大校长周寿臣，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香港有一座寿臣山，以他的名字命名；有驻美公

使梁诚，后来在他的斡旋之下，美国率先用“庚子赔款”设立“庚款留学计划”，用这笔战争赔款创立清华大学、选送大批留学生赴美留学；有驻智利公使欧阳庚；有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局局长、中国最早的私家车车主钟文耀；有京张铁路总工程师、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修建中国第一条由华人自行设计的铁路——京张铁路；有中国电报总局局长唐元湛和周万鹏；有北洋电讯局总办、北洋舰队统领、民国海军右司令吴应科。

这批留美幼童肩负着一个古老民族复兴的希望，他们稚嫩的双肩承载着太多不能承受之重。他们个体命运被这个大时代裹挟，身不由己，沉浮其中。幼童回国后的几十年无论是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还是辛亥革命、南北议和，但凡中国历史重大事件，在军事、政治、工商业舞台上都活跃着当年留美幼童们的身影，有时甚至占据了舞台中心位置。他们分处不同阵营，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奋斗搏杀，用热血和激情乃至生命书写一幕幕悲壮的历史画卷。

这一历史大事件，后来逐渐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踪迹难寻。



当年的留美幼童最后一次聚会，时光荏苒无情打磨着他们

一直到 2007 年中央电视台以留美幼童经历为题材拍摄了一部五集纪录片《幼童》，以客观公正立场深入哈特福德、春田中学寻访幼童后人、查阅历史文档，生动再现了当年幼童们的学习生活和后来的变迁，从厚厚的故纸堆中挖掘整理历史真相，供后人凭吊追忆和借鉴。

